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 资本权力布控的三大场域及其转换^{*}

闫方洁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资本权力布控

〔摘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逻辑正在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方式不断加强。从历时性角度出发，生产过程、日常生活、无意识构成了资本主义权力运作的主要空间。在生产过程场域，资本主义权力布展的主要途径是“合理化组织生产”，工具是“物化意识”；在日常生活场域，权力布展的主要途径是“控制消费”，工具是“虚假需求”、“大众传媒”、“符号体系”；在无意识场域，权力布展的主要途径是“抽空意义”，工具是“诱惑”、“虚空”、“景观”等。三大场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相继出场、层层递进，逐步开启了资本权力控制方式研究的微观视角。

〔作者简介〕 闫方洁，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上海 20024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福利制度的实施、多元价值观念的兴起，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至今日，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现象得到了改观，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即便是面对金融危机，现代资本主义似乎也可以采用更加缓和、人道的方式渡过。然而，在风平浪静的表层之下，资本与劳动是否走向了和解？抑或说，资本主义的控制逻辑是在强化还是在削弱？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控制逻辑正在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隐蔽的方式悄然加强。在深入研

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对无意识的控制犹如三根支柱，它们各司其职，共同支撑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权力巨幕。

一、“物化意识”与受控的生产场域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资矛盾”贯穿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便深刻揭示了资本家从雇佣劳动中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加深劳动异化、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资本家操纵着生产资料，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谋

^{*}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项目号：12JJD710003）和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自媒体’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机遇及对策研究”（项目号：14CKS032）的阶段性成果。

生,在商品、货币、资本的三重控制下,一种由两大对立阶级组成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在这一社会结构中,虽然矛盾冲突不断,但由于一方的绝对优势,另一方仍然被死死地压制在统治权力之下。

卢卡奇、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权力布控的核心空间仍然是“生产过程”。但是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权力布控的主要途径不是赤裸裸地剥削剩余价值,而是依靠“合理化组织生产”,或称“生产过程的物化”,资本家将工人禁锢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具体工具则是“物化意识”。所谓“生产过程的物化”是指,生产对象被机械地分解为各个部分,根据可精确计算和调节的原则来组织生产,整个劳动过程被割裂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物化的劳动过程不仅局限在物质生产领域,文化生产领域也同样如此。正如阿多诺所说,音乐、电影、戏剧、小说等文化产品的生产遵循着效率和简化的原则,走向了标准化、模式化、平面化的流水线作业,部分取代整体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生产的物化必然渗透、积淀到人的主体结构中,内化到人的思想、生存等一切活动方式中。具体来说,由于生产的客体被切分为多个部分,生产的主体也必然被切分为多个部分,工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人仅仅作为机械生产系统的一个环节而存在。“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1](P152)}此时便产生了“物化意识”。在物化意识的作用下,人们失去了观察世界的整体眼光和宏观视角,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们自觉地认同于片段、机械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构,“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先验地按不可避免的命运行事”。^{[2](P344)}面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人们无意反抗,更无力反抗,纷纷沦为马尔库塞口中“单向度的人”。

可以看出,上述通过机械地分割生产过程来催生物化和物化意识的观点明显受到了韦伯工具理性思想及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同样是对生产过程中资本权力运作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走

向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道路。如果说“剥削剩余价值”、“控制利润率”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批判,那么“物化意识”则是卢卡奇等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间接批判。前一种控制工具是有形、外在的且极易导致社会冲突,后一种控制工具则是含蓄、内在的且有助于调和矛盾。卢卡奇等人认为,借助于“物化”这一工具,统治阶级成功地抑制了工人的斗志,控制了工人潜在的革命精神,工人没有成为马克思所期望的革命承担者的原因便在于此,这也是他所感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

事实上,卢卡奇等人得出与马克思不尽相同的观点,是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二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而卢卡奇等人则采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方式深入到社会主体内部及其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二者的时代语境不同。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阶级矛盾较为显性、频繁,而卢卡奇等人所处的时代则较少发生正面的社会冲突和斗争。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理性强势登场,大大改变了生产过程和劳动特点,这为卢卡奇等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即便如此,卢卡奇等人在对资本主义控制方式的剖析中,依旧坚持了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他们提出的“物化意识”仍然主要地源自生产过程,这在很大程度契合了与马克思早期的劳动异化思想。但是,他们将来自生产劳动中的物化延伸至人的意识领域中,由此开启了一条从受众个体心理和意识的微观视角分析资本主义权力运作的新道路。这条道路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扬光大,他们将“物化”更广泛地应用到消费、娱乐、需求、本能等领域中,并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控制逻辑越来越具体和细致的揭秘。

二、“虚假需求、大众传媒、符号体系”与受控的日常生活场域

在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它密谋了一种更

加复杂、隐蔽的控制方式且极具迷惑性和欺骗性,因此仅局限于在生产领域分析资本主义权力运作机制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认为,20世纪中期以后,日常生活成为了社会权力布控的核心场域,资本主义统治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途径是控制消费,具体的工具则是虚假需求、大众传媒和符号体系。

在这些批判家眼中,日常生活并非与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范畴,而是一个充满主体交往和活动的文化领域。伴随着福特主义的兴起,社会越来越多地向人们提供商品,人们则忙于对汽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等各式商品的享受。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商品消费中,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将权力延递、渗透到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层面的有效途径。在消费中,人们转移了对工作领域异化的注意力,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统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3](P38)}

要长期使人们陷入消费囹圄之中,统治者还需要有力的工具,虚假需求、大众传媒、符号体系便是三个环环相扣的重要工具。虚假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3](P6)}其内容并非来自于个人真正的意愿。统治阶级不断制造出虚假需求,进而用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满足这种虚假需求。人们必须不停地消费,因为消费一旦停止,人们便陷入焦虑不安的心理世界,焦虑地等待被消费和消费品填充直到饱足。“需要就这样不停地被各种方法刺激着,在满足和不满足之间摆动。”^{[4](P79)}

而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成功地制造虚假需求并将其移植为个人需求,这要归功于强大的大众传媒,广告更是功不可没。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广告拥有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和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它使各种无意义的需求变得令人着迷。“它并不诉诸于理性,而是情感;像其他任何一种催眠暗示一样,它先着力在感情上征服对象,然后再让他们在理智上投降。这类广告用尽各种办法来打动顾客的心……”^{[5](P92)}人们无时无刻不被广告所暗示,乐此不疲地消费着社会告诉他要去喜欢

的东西,在物质欲望的满足中,人们对“丰裕”的社会产生了高度认同感。

然而,广告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呢?除了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支撑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它是一种符号体系,而符号则是隐匿最深的社会控制工具。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人借鉴了索绪尔、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学理论,对符号在资本主义权力布控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揭示。他们指出,符号拥有强大的象征和修辞功能,它自由地遮盖、掩饰、改变现实,并生产出丰富的意义。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物都沦为符号,成为社会价值的标识,其背后隐藏着严谨的社会等级。消费演变成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个人通过对符号的消费,表达着自己独特的社会身份。“在符号价值的虚构世界中,人们通过驾驶一款满意的轿车或穿着设计家设计的时装来消费权力和威望的符号”。^{[6](P124-125)}

广告作为符号体系,它将能指和所指任意联系起来,通过赋予商品充满诱惑力的文化意义来吸引人们。它以匿名的方式说服人们跟从它所暗示的社会共识、内化社会规范,拼命地通过消费挤进上流社会。列斐伏尔等人指出,除了广告,时尚、休闲、美丽、汽车、旅游、美食、影视、住宅等都成为包含着文化和差异的符号体系。消费者在符号的掩护下生活着,并获得奇迹般的安全感和宁静,这种宁静源于符号消费所带来的地位和尊严。面对广告和符号消费,大写的人消失了,每个阶层都丧失了自我意识,资本主义顺利地实现着对人的同化与控制。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在这个‘感受’层面上,把对世界(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围的排斥竟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7](P10)}

可见,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不再去研究生生产过程如何使人物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统治已经从生产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资本主义找到了权力布展的新途径——消费,它无声无息、潜移默化,极具诱惑力和迷惑性。宏观的政治管理和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借用技术、符号、文化等手段在消费的平台上市趋弥散化,各种边缘化的、多样化的微观权力开始出场并成为控

制机制的主角。他们不是把日常生活看作生产的“剩余物”，而是将其看作包含了丰富的意识形态生产与冲突的自组织领域。在这一领域中，虚假需求、大众传媒和多样的符号体系都成为统治者的同谋，它们共同制造了消费的漩涡，使人们争先恐后地跳入资本主义的权力秩序中而毫无知觉。

三、“诱惑、虚空、景观”与受控的无意识场域

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鲍德里亚、詹姆逊、德波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权力的布控形式和运作机制再度发生变迁。通过符号赋予意义的方式来控制人的需求及日常生活，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贪婪的权力欲望，资本主义开始将权力布控的空间转移到人的无意识领域，通过“诱惑”、“虚空”、“景观”等工具来抽空意义，从而实现了最高级别和最深层次的心理操控。

鲍德里亚指出，资本主义制造出“拟真的世界”，用比真实更真实的拟真逻辑阻止了本真意义的出场，从而使人类永远跌落在代表权力的符号控制中，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工具是“诱惑”。诱惑就是从话语中抽出意义并将意义从真理中转移出来。他认为，在后现代转向的新时期，通过赋予事物意义或者解释意义来宣传意识形态的话，极易被人们识破；相反，“连根拔出意义，将意义转变为游戏，根据游戏的某些规则和某些无法理解的仪式，将意义任意化，这比起掌握意义来更加冒险、更具诱惑性”。^{[8](P157)}当隐性、真实的意义被连根拔起之后，只剩下“肤浅”的形象和外表，这才是最具吸引力的东西。这种来自虚无的诱惑就像一种“没有光源的神秘光线”，^{[9](P12)}构成了资产阶级在后现代文化中实施权力布控的新途径，当代社会中的一切权力都是因为其背后的“虚无”才散发出巨大的诱惑力。

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以无意义为基础的诱惑发挥作用的场域，便是人的无意识。拉康认为，无意识支配着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无意识犹如语言构成，但是它仅仅是没有所指的能指，人的希望、欲求、意象统统作为一个个能指链存在着，它

永远在滑动、漂移和循环中。鲍德里亚吸收了拉康的观点，并进一步发现了可以操控无意识领域的工具。操控无意识，这是一切本质、意义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只有靠“诱惑”来完成。无所指的“虚无”在人们的无意识领域悄悄地传播着，它比意义流动得更快，它无需显现，当言语到达人的意识领域之前，它已经对个人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文化重视外在忽视内在的原因。例如，社会中充斥着无深度的电视节目，它们不关意义只关注形式，仅仅用视觉影像向人们呈现“超现实”的世界，人们所看到的仿佛是一面不反射的镜子，影像背后什么都没有却散发出神奇的魅力。

虽然詹姆逊和鲍德里亚的话语不尽相同，但他也承认后现代转向的发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指认，他们才要挖掘资本主义权力布控的新形式。詹姆逊指出，资本主义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介入了对无意识的统治。在詹姆逊那里，后现代文化同样是表面的、缺乏内涵和无深度的，它不寻求稳定的真理，只是在浅表层玩弄指符和文本。在排除了深层观念的浅薄中，人们获得的仅仅是无意义的装饰性展示，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不仅诱发了人们对商品的疯狂迷恋，而且压抑着人的所有意识和思维能力。“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播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心中的迷宫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10](P497)}

在德波那里，“景观”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统治阶级通过操控景观的生产和变换来控制社会生活。景观是指一切存在都转化为表象，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转向了以影像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在景观中，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事实。景观是主宰性的，它本身呈现为某种不同争辩和不可接近的事物，无需人们的应答。“景观使人们保存了一种无意识状态。像一个伪神圣的上帝，景观创造

自己,自己制定自己的规则。”^{[11](P8)}因此,面对景观通过各种媒介所制造出来的碎片化的、五光十色的欲望的对象世界,人们无从选择、无从反抗,只能肯定、顺从现存体制。

无论鲍德里亚、詹姆逊、德波等人是否有心做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是作为社会批判家,他们的研究视角较之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他们的分析中,似乎处处可见拉康、德里达等人的影子。毫无疑问,他们对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解读与后现代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德里达曾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能指链永远处于游戏之中,没有中心。鲍德里亚等人同样认为,组织化、系统化、结构化的权力控制模式已经被时代所抛弃,在后现代外观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布展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放逐真实意义,符号、景观才能实现各种关系的连接和互动,才能超越意识领域实现对无意识的控制,在越来越表面化和偶然化的游戏碎片中,隐藏着统治阶级更加阴毒的权力深渊。

结 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他们关怀普通人的生存境况,围绕着技术性、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性格与心理、国家管理、意识形态等问题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涉及领域多、涵盖范围广,要呈现其整体面貌绝非易事。然而,要彻底批判一个社会,首当其冲就是要找到权力布控的主要空间,在此基础上,才能挖掘出隐蔽的社会控制方式并进行反击。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生产过程、日常生活和无意识被指认为资本主义权力布控的三大场域。理论家们认为,在这三大场域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获得了不同的能指形态,并通过不同的中介指涉、干预着现实,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权力秩序和结构得到维护和延续。厘清三大场域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于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精髓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

三大场域的出场是前后相继的,但这并非是前后替代的线性关系,而是在不同时期对三者各有所侧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理论视角,对当下社会的存在方式做出了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在“生产过程”出场的时期,卢卡奇等人将社会看作一个总体,并强调生产的基础地位;在“日常生活”出场的时期,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虽然仍然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但他们认为社会统治已经从生产领域渗透到消费、文化和其他领域;而在“无意识”出场的时期,鲍德里亚、詹姆逊等人基本上放弃了“社会总体”、“社会实体”等概念,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无实体、无系统,充满差异、碎片和偶然的连接体。基于对社会存在方式的不同判断,他们对资本主义权力的运作空间和主要机制做出了不同的概括。然而,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在某些学者的文本中相互交织而非泾渭分明。

其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它们是批判逻辑内在延伸的必然结果。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道路,随着理论的演进,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大。从卢卡奇开始,他们就非常注重对个体生存状况的关怀,而对个体关怀的焦点又放在个体的感受、体验等主观意识上,之后又进一步聚焦在无意识领域。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道路——微观政治哲学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化和哲学发生转向的背景下,这种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不断深化,进一步强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资本主义权力控制方式的微观视角。这种崭新的研究视角使他们能敏锐地捕捉资本主义现代统治的若干隐蔽方面,他们的分析不能说不独到、不深刻,但是对于人们怎样着手改造发达资本主义,却说得很少,或者明显缺乏可行性。严格来说,倘若他们彻底撇开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仅仅局限于对资本权力控制的抽象形式的控诉,那么这种微观视角下的社会批判理论必然由于缺乏实践性而跌入乌托邦陷阱。

参考文献:

- [1]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M]. 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3.
- [3]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张峰, 吕世平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 [4]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s Publishers, 1994.
- [5] 埃里希·弗洛姆. 逃避自由[M]. 刘林海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 [6] 道格拉斯·凯尔纳,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转向[M]. 陈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7] 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8] 波德里亚. 生产之境[M]. 仰海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9] 张一兵. 诱惑:一个揭开后现代玄秘画皮的通道[J]. 学术研究, 2009,(5).
- [10]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陈清侨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11]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风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The Three Fields of Capitalist Power Control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Western Marxist Social Critical Theory

Yan Fangjie

(College of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social critical theory; capitalist power control

[Abstract] In Western Marxists' view, the control logic of capitalism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in a different way from the tradition. Production process, daily life, unconscious, constitute the three major fields where capitalism power operates. In the first field, the way to implement power is "r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tool is "materialization consciousness". In the second field, the way to implement power is "consumption controlling", and the tools are "false demand", "mass media" and "symbol system". In the third field, the way to implement power is to eliminating the meaning, the tools are "seduce", "nothingness" and "spectacle". The three fields appear before and after, but they don't substitute for one another. The three fields opened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capitalist micro-political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孔 伟]